

人生不留白

——《玩偶之家》与《一个小时的故事》的互文解读

宋彦

(上海健康医学院 外语教学部,上海 201318)

摘要:《玩偶之家》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名作,《一个小时的故事》是美国女作家肖邦的著名短篇小说,两部作品几乎作于同一时期,都是早期女权主义的代表作。国内现存的研究都是单独研究其中一部,将两部作品对比研究的论作还没有看到。采用互文性理论以及中国绘画艺术中的留白与补白艺术手法对两部作品进行互文解读,通过对比,更清楚地勾画出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在婚姻和社会中的真实处境。对比研究两部作品不仅为学界提供新的视角与观点,而且赋予两部作品新的艺术价值和美学含义。

关键词:互文性;他者;留白;补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1)01-0075-04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说“他人即地狱”。娜拉和马尔兰德夫人有着相同的地狱:她们的丈夫和她们所处的社会。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剧作《玩偶之家》(1879年)的女主角,马尔兰德夫人是美国女作家肖邦著名短篇小说《一个小时的故事》(1894年)的女主人公。娜拉的生活是马尔兰德夫人猝死前人生的补白;马尔兰德夫人猝死的遭遇是娜拉后半生可能的结局。两位女性“拼接”而成的完整人生,如同一面照耀女性历史的风月宝鉴,正面显示的是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社会赋予女性的“完美主妇”生活,反面折射出男权社会中疯狂主妇所受的压迫、绝望与觉醒。对几乎处于同一时期的新旧大陆两位女性形象的解读,不仅有助于我们认清男权社会受压迫的女性集体命运,而且也能帮助我们重新认识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浪潮中女性逐渐觉醒、为追求自我而作的抗争。

一、互文性

“互文性”也有人译作“文本间性”,是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强调文本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

关系。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于1969年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她认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文本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1]罗兰·巴特也指出:“任何本文都是互本文;在一个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本文:例如,先前文化的本文和周围文化的本文。”^[2]解构者米勒也曾谈道:“一个文学文本自身并不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而是与其他文本的关系,而其他文本又是与另外文本的关系——文学研究就是对文本互涉性的研究。”^[3]广义的互文性注重的是文本的海洋中,一个文本对其他文本的折射关系。文本的存在状态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有联系的,互相参考、印证,正是这种参考和印证,为文本的价值生成和意义构造提供了可行性。男性剧作家易卜生创作的剧作《玩偶之家》讲述的是发生在旧大陆挪威的故事,女性作家肖邦创作的小说《一个小时的故事》叙述的是新大陆的故事。但是,这两部作品创作的时间1879年和1894年都在女权主义的第一次浪潮之间;两部作品都探讨了婚姻中的两性关系和女

收稿日期:2020-10-19

基金项目:上海市2019“教师专业发展工程”项目阶段性成果(A1-2601-19-311001)。

作者简介:宋彦(1976—),女,四川眉山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英美文化。

性的命运与处境。相近的历史文化背景、主题和题材以及人物形象为两部作品的解读提供了互文基础。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

二、他者:共同的命运

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波伏娃认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长期处于第二性、处于他者的地位。娜拉和马兰德夫人的命运就是最好的诠释,他者是二人共同的命运。在政治上,挪威1907年才赋予部分女性选举权,美国则是1920年才给予女性选举权。娜拉和马兰德夫人在政治上根本没有任何地位。在经济上,海尔茂说“从此以后他老婆越发是他私有的财产”。娜拉控诉道:“这些年我在这儿简直就像个要饭的叫花子,要一日,吃一日”。在社会上,娜拉在重大事情上没有发言权,“做老婆的不得她丈夫的同意没法子借钱”。在心理上,海尔茂总是以各种貌似甜蜜,实则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语言向娜拉施加压力和压迫,如“我的小鸟儿”“我的松鼠”“我的孩子”等等。这些将女性物化的语言,让娜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他者的地位。当时“社会认可的妇女形象为‘温柔、顺从、贞洁、虔诚’”^[4]和娜拉一样,马兰德夫人在婚姻中,也是屈从于丈夫的意志之下,处于被支配地位。“再不会有强烈的意志迫使她屈从了……居然有人相信,盲目而执拗地相信,自己有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大家都知道马兰德夫人的心脏有毛病,所以把她丈夫的死讯告诉她时,是非常注意方式的”,“她白皙纤弱的双手”,这些都暗示着马兰德夫人的弱者形象。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社会,还是心理上,娜拉和马兰德夫人都处在丈夫的意志与压迫之下,是丈夫的金丝雀、玩偶与傀儡。生为女性,沦为他者,是两位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共同命运。

三、马兰德夫人的前尘往事

《一个小时的故事》的故事很短,只选择了一个点:马兰德夫人猝逝前的一个小时。马兰德夫人在故事中只活了一个小时。那马兰德夫人之前过着怎样的生活呢?马兰德夫人一生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作者在这儿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艺术手法类似中国艺术创作中的留白。留白指书画艺术创作中为使整个作品画面、

章法更为协调精美而有意留下相应的空白、留有想象的空间。《一个小时的故事》短小精美,充满张力,集中描写一个时间点:一个女人死前的一小时,留下读者去猜测主人公之前是怎样度过她的一辈子的。当我们把《玩偶之家》与《一个小时的故事》作互文解读时,《玩偶之家》成了《一个小时的故事》最好的补白。和留白相对,补白也是书画创作中的专用语,是指在作品留有空白的地方“润色。”当我们把娜拉和马兰德夫人的生活“补白”“拼接”在一起时,就如同两块七巧板拼出了一幅真实暗淡的画面。娜拉的生活,也许就是马兰德夫人的前尘往事。从她白皙纤弱的双手,我们可以看出,马兰德夫人应该不事劳作,生活比较富裕。娜拉也是来自比较富裕的家庭,林丹太太说“从前咱们一块念书的时候你就是个顶会花钱的孩子”。结婚以后,虽然为了还债,娜拉生活比较拮据,但是她的家庭依然还能雇佣保姆。马兰德夫人和娜拉一样,都很美丽,“她还年轻,美丽”,可想而知,马兰德和海尔茂一样,都是贪恋妻子的美色,而娶了她们。但是,再美的妻子也只是女人,相夫教子,家庭与婚姻是她们的全部。接到丈夫的死讯,马兰德夫人想到“没有人会替她做主……,再不会有强烈的意志而迫使她屈从了……,居然有人相信,盲目而执拗地相信,自己有权把自己的一直强加于别人。”

可以推断,马兰德夫人生前几乎是完全屈从于丈夫,以丈夫和家庭为中心,她的命运可以从她的称谓看出。她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只是冠以夫姓,被称为马兰德夫人。娜拉所过的生活,可以说是马兰德夫人生活的具体展现。如同马兰德,海尔茂控制着妻子的一切。娜拉如何花钱他要管;娜拉如何说话,他也要管。“你只要一心一意依赖我,我会指点你,教导你。”娜拉控诉她是如何屈从于丈夫的意志:“其实还不只八年,咱们从来没有在正经事情上谈过一句正经话”,“我在家跟父亲过日子的时候,他把他的意见告诉我,我就跟着他的意见走,要是我的意见跟他不一样,我也不让他知道,因为他知道了会不高兴”,“我从父亲手里转移到了你手里。跟你在一块,事情都由你安排。”在娜拉的生活中,连她吃甜杏仁饼干,海尔茂都要管。由于《一个小时的故事》是短篇小说,作者对马兰德夫人与丈夫的关系只是含蓄地点到而止;而《玩偶之家》则将婚姻中男女相处的细节一一加以呈现。《玩偶之家》虽是剧作,却

如同叙述马兰德夫人生前故事的中篇小说。在留白与补白中,娜拉和马兰德夫人的命运前后连贯,融为一体,使读者对19世纪末期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妇女的生活有了更具体深入的了解。留白与补白形成的完整画面,也更加生动地展现出男权社会的世俗婚姻关系。

四、娜拉可能的结局

如果娜拉不出走,继续和海尔茂生活在一起,她的结局也可能像马兰德夫人一样:猝死。文学史上,鲁迅先生曾就《玩偶之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题:娜拉走后怎样?他认为娜拉出走之后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在此,我们也提出另一个论题:如果娜拉伪造签字的事情没有败露,有一天,她接到了海尔茂的死讯,她会有什么反应呢?她的反应应该和马兰德夫人差不多:表面上有些许悲哀,但是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医生来后,他们说她死于心脏病——说她是因为极度高兴致死的”。《一个小时的故事》虽然是短篇故事,但是故事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比戏剧《玩偶之家》更具有戏剧性和讽刺性。马兰德夫人确实是因为“极度高兴致死的”,这“极度高兴”有着双重含义和反讽意味。因为丈夫的死讯,马兰德夫人意识到自己最终可以彻底自由了,丈夫已经去世,他不能再把他的意志强加于马兰德夫人,“有了独立的意志,爱情这未有答案的神秘事物,又算得了什么呢?自由了!身心自由了!”“她正透过那扇开着的窗子畅饮那真正的长生不老药呢,在纵情地幻想未来的自由美好岁月,春天,还有夏天以及所有各种时光都将为她所有”,“她的眼睛里充满了胜利的激情”。开着的窗子象征着自由之门正在向着马兰德夫人打开。丈夫的死讯让妻子极度高兴,这是婚姻的黑色幽默,是两性关系最悲哀的嘲讽。但是,故事中,除了马兰德夫人的鬼魂知道自己的真正死因,她身后的世界却以为她死于另一种“极度高兴”:那就是亲爱的丈夫并没有死,而是突然出现在马兰德夫人的面前。这瞬间的从死到生、失而复得的狂喜和极度高兴让马兰德夫人的心脏承受不了,最后马兰德夫人猝死。

“当然,她是爱过他的,有时候是爱他的,但经常是不爱他的。”这是马兰德夫人对丈夫的情感状态。娜拉对海尔茂的情感也不过如此。在婚姻的开始阶段,娜拉并不清楚海尔茂的真正为人,那时她是爱海尔茂的,所以才会在海尔茂身患重

病时,不顾一切风险借高利贷,为海尔茂治病。但是多年的婚姻生活让娜拉逐渐认清了海尔茂的品性,她其实已经不爱海尔茂了。当多年未见的老同学林丹太太来访时,娜拉非常直接地问“告诉我,你是不是不爱你丈夫?”这其实也是娜拉对自身婚姻的一个反思和投射。同时,娜拉和阮克大夫的暧昧关系,也揭示了娜拉早已不爱丈夫的事实。海尔茂对娜拉而言,更像一个需要讨好的父亲。她认识到自己婚前是父亲的泥娃娃孩子,婚后是海尔茂的泥娃娃孩子,“把我当成一件玩意儿”,都是任人摆弄,没有自由意志的玩偶。“跟你在—块儿,事情都由你安排。你爱什么我就爱什么。”“这整整八年,……咱们从来没在正经事情上谈过一句正经话。”受够了的娜拉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在逃避、抗争、向往自由和独立。未出嫁时,当她不愿忤逆父亲意见时,她选择逃避,而和仆人交谈。婚后,当她不愿和海尔茂相处时,她把感情寄托在几乎天天到访的阮克大夫身上。

娜拉以自己的方式悄然反抗海尔茂。剧中,有一大一小两个典型的例子,小例子代表着生活中无关大雅的小细节;大例子关乎个人生死和家庭存亡。海尔茂不准娜拉吃甜杏仁饼干,但是娜拉一有机会就偷吃,甚至怂恿别人和她一起吃,追求自己“吃杏仁饼干”的自由。这虽是生活中很小的细节,但管中窥豹,可以看出娜拉对海尔茂的厌恶和反叛。而另一个例子,却是娜拉心心念念的“正经事”。为了拯救身患重病的海尔茂,娜拉瞒着丈夫找外人借了巨额高利贷。不仅如此,还在婚后数年含辛茹苦地背着丈夫按时偿还高利贷。娜拉从生活费中省吃俭用,兜揽所谓轻巧的活计,如刺绣、缝补、抄写文件,拼命苦干,才能确保按时还款。娜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骄傲,觉得自己为家庭做了一件大事,她为自己能和社会打交道,能够为家庭贡献自己的力量感到自豪。和马兰德夫人一样,娜拉渴望自由,渴望独立。“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我现在把你我的义务全部解除。你不受我的拘束,我也不受你拘束。双方都有绝对的自由。”八年多的婚姻生活,已经让娜拉真正认清了海尔茂是怎样自私、专横、虚伪、虚荣和刚愎自用的一个男人。“两位丈夫对妻子甜言蜜语的诉说听来令人动容,似乎他们的家庭是一个浪漫的乐园。但在温情脉脉的背后,其实都是暗流涌动”。^[5] 其实在伪造签字的事情

败露之前,娜拉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虽然她已经彻底了解丈夫的为人,但是念及多年夫妻的情分,娜拉还存在一丝的侥幸,连她自己都承认,如果海尔茂真的愿意替她担下罪名,那简直就是奇迹。由此可见,如果婚后多年,有人突然给娜拉送来海尔茂的死讯,娜拉一定也会和马兰德夫人一样,表面悲哀,而内心狂喜。摆弄玩偶的人突然死了;关着鸟儿的笼子突然打开了,上天突然赐给她自由与独立,娜拉为何不喜?如果娜拉碰巧也有心脏病,她也会像马兰德夫人狂喜而死。

五、结语

互文性视野下的文本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无须其他的自我,它们的生命力更在于它们是在一个文本之网中确定自我。《玩偶之家》补白了《一个小时的故事》中马兰德夫人的生前故事;《一个小时的故事》提供了娜拉生命结局的另一种可能。对两个文本的互文解读,为我们揭示出19世纪末期的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两种生存方式。一种是男性界定的女性生存方式,就如同海尔茂

所说:“你最神圣的责任是你对丈夫和儿女的责任”。另一种是女性为自己界定的生存方式,如同娜拉所说:“我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我说的是我对自己的责任。”女性的自我在压迫中慢慢觉醒,娜拉和马兰德夫人呈现出两种生活状态和心理。一种是表面上对男性和社会的迎合;一种是心灵深处对男权社会的抗争与反叛。马兰德夫人得知丈夫的死讯时,“她还是会哭的”。这是男性和社会对她的期待;“不过她透过那痛苦的时刻看到,来日方长的岁月可就完全属于她了。她展开双臂欢迎这岁月的到来。在那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没有人会替她做主,她将独立生活。再不会有强烈的意志而迫使她屈从了。”自由和独立,不仅是马兰德夫人的渴望和梦想,也是娜拉的追求与梦想。《玩偶之家》与《一个小时的故事》可以说是彼此的一个注释,两个文本的互文解读勾勒出新旧大陆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侧影。娜拉和马兰德夫人遥相呼应、互相诠释,为女性觉醒走向独立自主留下了两个魅力无限的女性文学形象。

参考文献:

- [1] Julia Kristev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The Kristeva Reader[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53.
- [2] [法]罗兰·巴特. 文本理论[J]. 张寅德,译. 上海文论, 1987(5): 90-96.
- [3] 徐静静. 永恒的“连锁”——从《作为寄主的批评家》透视米勒解构主义中的互文性理论[J]. 昆明民族干部学院学报, 2016(1): 56-57.
- [4] 程晓娟. 《一个小时的故事》: 寻求性别解放的心灵呼唤[J]. 芒种: 下半月, 2016, 501: 83-84.
- [5] 艾秀梅. 失信、失序、失语与失位——浅析家庭伦理视阈中的《玩偶之家》[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9(3): 123-130.

Life without any Blank: An interpretation to *A Doll's House* and *The Story of an Hour* in the Context of Intertextuality

SONG Yan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Medicine & Health Sciences, Shanghai 201318, China)

Abstract: "A Doll's House" is a world-renowned play by Henrik Ibsen, a Norwegian playwright, and "The Story of an Hour" is a famous short story by Kate Chopin, an American writer. Both works were written during the Women's Rights movement. Research to date has focused on "A Doll's House" and there is no study comparing them. I draw upon theories of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techniqu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of using blank spaces to created images to interpret these two works. I argue that this interpretation will help readers understand better the real situation of women in marriage 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a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This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se two works provides new sights and offer novel artistic values.

Keywords: intertextuality; the other; leaving blank space; filling the blank space

(责任编辑:李 军)